



博习文丛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席富群 ● 著



#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 创新史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博习文丛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席富群◎著



# 中国共产企业文化思想 创新史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创新史论 / 席富群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2

(博习文丛)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672-2215-1

I. ①中… II. ①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化—党的  
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202 号

书 名：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创新史论

著 者：席富群

策划编辑：刘海海

责任编辑：刘海海

装帧设计：吴 钰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品 人：张建初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印 刷：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Liuwang@suda.edu.cn QQ：64826224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5225020

开 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67 千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2215-1

定 价：6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 自序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各国都将其发展和创新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和创新思想,无疑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创新之路具有重大意义。既然要研究这样的课题,首先就必须弄明白“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思想”,“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

“文化”可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最难界定的概念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旷日持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化学研究者公认最早对“文化”一词进行经典性概括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他在1871年写的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做了如此界定:“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后来,美国研究社会学、文化学的一些学者对该概念纯观念、缺实物的弊端进行了一些修补,提出了一些新定义,但所有的定义都没有超出泰勒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基本观念。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1905—1960)曾在《文化概念:一个重要概念的回顾》一文中对161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这些概念基本上都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sup>①</sup>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在《论文化》一书中,从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角度来阐释文化概念。他说,“文化,文化,言之固易,

<sup>①</sup> [美]克莱德·克鲁克洪等著,高佳等译. 文化与个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5.



要正确地加以定义及完备地加以叙述，则并不是容易的事”，“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sup>①</sup>。马林诺夫斯基还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他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四部分。马林诺夫斯基功能学派文化学理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要素。”他说，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制度”。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着社会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侵略，开始了漫长的中西古今文化的论争，并在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在长期论争中，研究文化学的知识分子也对“文化”的定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梁漱溟先生 1922 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样法”。他把人类生活的样法分为三种：“（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时他既不像第一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将此种问题取消，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但是最违背生活的本性，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梁漱溟把这三种态度分别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恰好各走了一条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一生对中国儒家文化情有独钟。

1920 年蔡元培在湖南演讲《何谓文化？》，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并列举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事。

1922 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书中谓：“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在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中，文化包括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可见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

胡适则于 1926 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化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文

<sup>①</sup>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 文化论[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14.

化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生活方式。”

陈独秀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对文化界关于文化的宽泛定义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到文化如此广泛，以至于无所不包？”他力主文化“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

可见，给“文化”概念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件困难的事情。马云杰先生曾说过：文化的定义已如此之多，分歧如此之大，如果想回避矛盾，少惹是非，“最聪明的办法是列举文化的几条基本特征而不给它下定义”。研究文化概念的法国学者维克多·埃尔也认为：“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

但是，通过对众多文化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内涵不同的三种文化观：即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吸收和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出版的《辞海》对广义“文化”和中义“文化”的概念都有界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关于狭义文化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完整的表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在该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节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sup>①</sup>这一文化观念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

本书基本上采用的是狭义“文化”的概念，即毛泽东阐述的文化概念。

“文化思想”，顾名思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认识和观念的系统论述。我认为，思想概念与认识、观点、观念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理性和体系性，后者的感性和非系统化。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对文化问题的认识并非总是理性的、系统的，但这只是反映了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不妨碍其总体上的理性化和系统化。说到文化思想，还有一个常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95.



见的概念叫“思想文化”，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书名和研究机构的名称。思想就是思想，我们知道“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那么为什么说是思想文化呢？这是因为思想是文化中最关键、最核心、最能反映文化的部分，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观念文化的三分法中，思想属于文化构成中的最深层面——观念文化。所以，从最狭义的文化观看，“思想”和“文化”几乎可以画等号。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无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对于文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以 1949 年为界，之前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是近代中国众多文化思想中的一家，因为共产党本身不是执政党，她的思想不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以它为指导的共产党必定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未来社会的主宰力量。所以，1949 年以后，当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其思想必然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本书描述的正是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问题的思想。

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走向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阐述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也是对近百年中国文化界论争的一个科学总结。时至今日，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概括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的内容。

但是，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须遵循与时俱进的规律。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当新民主主义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世界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显得不足时，如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挫折一样，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理论及实践也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在社会高度整合、高度政治化，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极紧的时代里，人类在古今创造的一切文化都曾经被当成“封资修”和“大毒草”进行批判。

当中国从“文革”造成的文化荒漠中站起，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断了几十年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问题的讨论再起，它涉及的主题仍然是“中华民族向何处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反思、分析和继承，对外来文化进行以我为主的吸纳和借鉴，对

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进行思考和设计,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创新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表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伴随着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化上的大发展、大繁荣阶段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思想和理念,这无疑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及中国梦的实现插上翅膀,使中国文化为中华民族腾飞和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席富群

2017年4月

#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创新 .....	1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产生的背景 .....	1
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阐述 .....	10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地位 .....	22
执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内的批判与重建 .....	27
一、执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	27
二、中国共产党对旧文化的批判与改造 .....	41
三、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文化模式的初步构建 .....	54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论探索 .....	60
一、中国共产党和知识界对文化领域内教条主义的反思 .....	60
二、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探索 .....	65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左”的偏差 .....	76
历史转折中正确文化思想的回归 .....	87
一、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论争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87
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 .....	98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科技教育和文艺政策的拨乱反正 .....	115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	128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提出的背景 .....	129
二、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 .....	137



三、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 .....	145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 .....	153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背景 .....	153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 .....	161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各种 关系的思想 .....	170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建设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初步建构 .....	185
一、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先进文化结合的背景 .....	185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 .....	195
三、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探索及其成果 .....	212
中共十八大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	219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 .....	220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完整思路 .....	222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倡及意义 .....	224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继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 .....	228
一、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与魂的论述 .....	228
二、习近平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论述 .....	232
三、习近平关于科学对待传统文化问题的论述 .....	240
后记 .....	246

# 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的重大成果。而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并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取得丰硕成果，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抛开中国传统文化有接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因子不讲，近代学习西方的层层深入和最终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扫清了道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则是部分中国人拥抱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诉求。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在众声喧哗、方案迭出的论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成果中的文化建设理论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也始终发挥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产生的背景

众所周知，研究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绝对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必须把它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并联系国民党史、民国史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还必须结合中国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中国人的苦闷、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和“五四”救亡运动的发展以及抗战前夕产生的新启蒙运动都是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无法绕开的背景。

### 1. 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准备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



化,和资产阶级倡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质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持久传播和发展,就没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标志着旧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高峰的新文化运动为其扫除了思想障碍以后才得以在中国传播的。

新文化运动是指 20 世纪初中国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专制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 年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专制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陈独秀勇猛地向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地位、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学术界已经有了大量详细、周密、深刻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现仅就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的条件做一较详细的论述。

首先,新文化运动对专制迷信、封建礼教和道德的猛烈攻击和批判,对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张扬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准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会认为,对专制思想文化的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前提,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不大。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也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种文化,它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超越,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否定。抛开阶级的意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专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专制思想统治的社会里马克思主义能有立身之地。只有在经历了思

想启蒙、个性解放的环境里，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容身，才能够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这样的条件。

其次，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解放、兼容并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员。

新文化运动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界的先驱们倡导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兼容并蓄，西方各种思潮犹如水泻闸门，汹涌而入，形形色色的思想、主张都陈列在中国思想界的舞台上，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思潮共有几百种，其中广为流传的有三大类：一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潮，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说；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生命哲学、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实用主义等；三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西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很复杂，真假难辨，如日本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修正主义等都是被当作“社会主义”在传播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家。

最后，新文化运动中高扬的科学旗帜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被推崇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近代以来，科技发达使西方强大，科技落后造成中国被动挨打成为众多中国人的共同观念。所以，尽管对“民主”的价值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大多中国人是认同的。五四时期，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科学被中国人接受的。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被看作科学观察和解释人类历史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当时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 2. 五四爱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而现实的民族危机则使部分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国的新武器。所以，马克



思主义进入中国是现实救亡的需要。五四爱国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由于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所以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而是从苏联来的，是教条主义。其实，我更愿意将毛泽东的话理解为‘十月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榜样”。事实上，“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的，既有来自俄国的，也有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日本也是主要渠道之一。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是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五四时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都有留日的背景，并且是从日本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然，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将其作为学问来研究的，并不认为它可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那么，“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工具在中国积极传播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是其传播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极其丰富，就其研究对象看——它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世界观，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说；就其阶级

属性看——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般原理；就其主题看——它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严格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尽管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种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但它能够为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当时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

其次，学习“西学”的失败和西方文明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前赴后继，进行了艰苦斗争和探索。但是，对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他们能够提出的救国方案只能是学习“西学”。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的。从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掀起“求富求强”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并进行“百日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发动辛亥革命实现中国在 20 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多，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夜，共计 70 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抗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sup>①</sup>

学习西方的接连失败难免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是否适合中国发生怀疑。而正当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中国作为战胜的弱国和战败国一样在巴黎和会上的被践踏，使国人对“公理战胜强权”的谎言彻底失去了幻想。当救亡再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时，现实迫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13 – 1514.



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救亡”？

实际上，在19世纪末，德国的哲人尼采就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文明的危机，提出要重估一切传统价值，喊出“上帝已死”这一震世骇俗的激愤之声。但尼采的声音在当时被认为是痴人呓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上帝已死”的观念在欧洲化为一种普遍的情绪，人们对西方文明疑惑、彷徨、沮丧、失望……终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于1918年发表了名闻遐迩的《西方的没落》这部皇皇巨著，斯宾格勒在这部著作中表达出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也风行一时。一些知识分子反而转向东方的思想和宗教，企图在“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找内在的平衡、心灵的和谐与精神的慰藉。中国的《老子》《庄子》等典籍就是在那时传入欧洲的。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当年以力主“采西学”、宣传新思想著称的梁启超率张君劢、丁文江等人于1918年年底踏上了疮痍满目的欧洲大陆。他们马上被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破坏和精神的深创巨痛所震撼。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的健将一反以往，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1920年，他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惊呼：“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渴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凄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西方文明既然出了问题，那么以批判西方文明的形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为救国工具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人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的，既然有西方人来否定西方的文明，这正迎合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复杂心理。

最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榜样。

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此之前，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但中国人与它是隔绝的。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首先，“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向全人类展示了共同的美好前景，它的胜利，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伟大的威力；其次，爆发“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处在与近代中国相同或相似的

情况下,相同表现在专制压迫都很严重,相近表现在经济文化都较落后;第三,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俄国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先进分子产生了特殊吸引力。此后,中国先进分子根据鲜活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事实,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 3.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局限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史的角度,不大与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发展相联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前面所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和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一样,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结出的丰硕成果,与抗战时期的“新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

1936年9月,陈伯达在上海《读书生活》上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认为自3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国内即掀起了尊孔读经的逆流,这种思想目前正成为敌人和汉奸愚昧中国人民的工具。他建议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武器,继续对中国的旧传统、旧思想、旧宗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与哲学上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进行联合。

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时,北平许多报刊都出了“五四”纪念特刊,重新认识“五四”的价值,阐发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和内容。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也召开纪念座谈会,讨论提倡民主科学、反对迷信愚昧和专制思想等问题。5月上旬,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会同张申府、张友渔、杨秀峰等人,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启蒙学会,并吸收了北平文学教育界人士参加。

为了拓宽新启蒙运动的范围,1937年6月,艾思奇编辑的《认识月刊》专门出版了“思想文化特辑”,集中讨论新启蒙运动。这时,陈伯达不再提及唯物辩证法的主导地位,他重新解释了新启蒙运动的性质,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